

导论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征程中的伟大旗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物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必将胜利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开创更加壮丽辉煌的前程。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一贯的指导原则。这种相结合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集中的表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不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相结合，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还是采取创造性的态度，历来存在着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者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把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作为模式，脱离中国实际企图通过“城市暴动”取得革命的胜利，结果导致了“城市暴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使全党同志猛醒，从而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提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经过延安整风，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比较彻底地清算了教条主义，使全党同志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1945年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很多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

新中国的正确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中的表现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是继民主革命后又一个“必然王国”。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实践中没有现成模式。虽然建国初期，我们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摸索、总结了许多经验，并有一些创造。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还是知之甚少，并未解决，以至于出现了许多失误，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重新认识中国国情，探求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党就开始注意独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集中地表现在：首先，在本世纪50年代

初，他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出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其次，他从 1956 年起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在 1956 年 4 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他从理论上全面展开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重要标志。此后，他继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主要有：（1）中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互矛盾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这些矛盾；（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3）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5）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6）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强调不要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积累与消费、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关系；（7）在经济工作中实行

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实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8)在企业中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9)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0)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是毛泽东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内“左”的错误情绪也滋长起来。继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之后，1958 年我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在短时间内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和党中央曾经觉察到并努力领导全党来纠正这些错误。但是，1959 年 8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又错误批判了坚持正确意见的彭德怀等同志，并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期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是我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严重挫折。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从 1960 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先后制定了有关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条例和规定。在 60 年代初期，还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

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给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同志摘掉了帽子。由于执行这一系列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也大有好转。特别是 1962 年 1 月，毛泽东在有全党高中级干部 7000 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和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表明我们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在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各方面形势都大为好转之时，党内“左”的思想情绪又蔓延起来。在 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夸大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 1963 年春开始，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又发展到城市，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后来又波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政治批判。1965 年 1 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此，阶级斗争扩大化迅速升级，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

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探究毛泽东的本意，也是希望能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但事与愿违。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竭力挑起内乱，并持续十年，使党和国家陷于灾难沉重的深渊。这是我们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又一次严重挫折。

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一命题提出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领导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制定了以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以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路线。这一时期，邓小平提出了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现代化建设必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的观点，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观点，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义”这一重要命题。

从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到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形成的时期。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强调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大力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1986 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思想。这些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实了新的内容。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通过对我国国情的深入分析，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十二个方面作了初步概括，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国前进的科学轨道。

从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到 1992 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理论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和国际都相继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主要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我国也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但我国经受住了考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不

断改善和提高。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从十二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的基本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的呼唤下，不断丰富发展。1992年1—2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党的十四大以这一重要谈话为指导，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初步构建了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经过十五大修改的党章，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一、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人们认识事物，历来有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一条是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要求一切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出发，认真研究客观事物内在规律，作为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依据和前提。解放思想，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它强调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要不断前进，才能反映变化了的实际。它要求敢于实践，大胆探索，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破除种种迷信和盲目崇拜。

毛泽东对我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作出了伟大贡献。他总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大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经验教训，先后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重要文献，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等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党的正确的认识路线即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吸取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但自 1957 年起，我党开始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至产生了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四清”运动中的严重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生了全局性的错误。1976 年 9 月，我们党胜利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由于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使刚刚开始的对“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遇到了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为恢复我党正确的思想路线，论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的，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①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解放，迷信书本，迷信先哲，迷信已有的模式，迷信他人的经验，那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样，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如果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客观规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364 页。

律。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解放思想就会成为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成为违背客观规律的空想。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割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注意克服主观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掌握唯物辩证法，按客观规律办事。他在 1977 年复出工作后，多次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发扬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支持下，1978 年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对于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重大作用。

1978 年 11 月，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实事求是；而在当前，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风中存在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只要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14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141 页。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我党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我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两个凡是”等错误口号，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进行。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一大批遭受冤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广大干部恢复了名誉，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肯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理论建树，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总结中国实际和正确分析时代特征所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等问题上，都有过各种疑虑和不同意见。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话，逐步澄清了是非，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转变了观念，统一了认识。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已经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全面评价。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

（一）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正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邓小平多次申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设社会主义“靠的是马克思主义”。^①他强调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②“老祖宗不能丢”，也“没有丢”，指的就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以及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话。邓小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辩证统一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依据是全面总结国内国际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走自己的道路，既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国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就必须正确对待和全面总结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并从中科学地概括具有自己特色的理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6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36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3 页。

论和路线。邓小平理论总结了近 20 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总结了国际上苏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教训。其中，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经验，特别是总结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的最新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直接依据。没有 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有对这些伟大实践所提供新鲜经验的理论概括，从而产生出新的理论；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新进展、新成就，就谈不到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不可取代性。

（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是科学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当代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全球化和国际经济联系愈益密切；世界格局继续走向多极化，谋求和平、稳定与发展是国际形势的主流；等等，这一切都使“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邓小平依据当今时代特征的主题、主流，依据世界科技、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科学地阐明了我国争得较长时间和平环境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既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扩大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又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特别是，在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发生新变化的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成为一个高难度的时代性课题。时代提出的课题和时代提供的条件都历史地置于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历史大背景。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含义十分深刻。从中国范围而言，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但这不是只在某些问题或某些领域中的简单的一般的继承和发展，而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历史课题不同、实践过程不同从而在整体上的推进。毛泽东思想是以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则是在新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从世界范围而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不仅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化了，而是立足当代中国面向世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历史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的崛起，不仅使喧嚣一时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破产了，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从整体上全方位地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基础。